

韩非思想研究：以黄老为本

王威威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韩非思想研究：以黄老为本

王威威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非思想研究:以黄老为本 / 王威威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 - 7 - 305 - 09047 - 9

I. ①韩… II. ①王… III. ①韩非(前 280~前 233)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226.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6116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韩非思想研究:以黄老为本
著 者 王威威
责任编辑 李 红 编辑热线 025 - 83593962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常州市武进第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15.5 字数 300 千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9047 - 9
定 价 32.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言

韩非是集法家思想之大成者，他才华横溢，也因才被杀，正如庄子在《人间世》中所讲：“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司马迁感叹韩非聪明却不能自保：“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韩非揭露了人好利恶害、自为的本性，撕掉了人与人关系中温情的面纱；他论证了君主的至上地位，教给君主因势用术；他高举法的权威，批评仁义礼治。他留下了代表其思想的大量篇章，形成了《韩非子》一书。

韩非思想在秦朝得以实践，而用韩非之术的秦朝却二世而亡；汉代以后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而韩非思想与儒家思想不合。因此，历代学者对韩非其人及其思想的评价争议颇多。汉代的王充《论衡》中有《非韩》篇，指出韩非非儒，废礼义，但礼义是国家得以存在的根本，民无礼义必将倾国危主：

韩子非儒，谓之无益有损，盖谓俗儒无行操，举措不重礼，以儒名而俗行，以实学而伪说，贪官尊荣，故不足贵。夫志洁行显，不徇爵禄，去卿相之位若脱骥者，居位治职，功虽不立，此礼义为业者也。国之所以存者，礼义也。民无礼义，倾国危主。

韩非尚法、重术、尚功用：“韩子之术，明法尚功。”但王充指出重术的韩非并不明了“术”的真意：

今不言鲁君无术，而曰“不闻奸”；不言[不]审法度，曰“不通下情”，韩子之非缪公也，与术意而相违矣。

其重术的思想又与其所尚之法相违背：

而不言明王之严刑峻法，而云求奸而诛之。言求奸，是法不峻，民或犯之也。世不专意于明法，而专心求奸。韩子之言，与法相违。

而韩非的尚功用，是危亡之术：

贪，故能立功；骄，故能轻生。积功以取大赏，奢泰以贪主位。太公遗此法而去，故齐有陈氏劫杀之患。太公之术，致劫杀之法也；韩子善之，是韩子之术亦危亡也。

也就是说，王充对韩非的非礼义、尚法、重术、尚功用思想持全面否定的态度。宋代的苏轼著有《韩非论》，讲道：

自老聃之死百余年，有商鞅、韩非著书，言治天下无若刑名之贤，及秦用之，终于胜、广之乱，教化不足，而法有余，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

他认为秦用韩非的思想以法治国，不重视对民众的教化，导致王朝速亡，贻害天下。元何卞《校韩子序》云：

其书言法术之事，贱虚名，贵实用，破浮淫，督耕战，明赏罚，营富强。臣卞窃谓人主智略不足，而徒以仁厚自守，终归于削弱耳。故孔明手写申、韩书以进后主，孟孝裕亦往往以为言，盖欲其以权略济仁恕耳。今天下所急者法度之废，所少者韩子之臣。伏唯万机之暇，取其书少留意焉，则聪明益而治功起，天下幸甚！

他肯定韩非之书阐述了法术思想，重视实用、督促耕战、严明赏罚、谋求国家富强，可以补充以仁义治国的不足。明代赵用贤在《韩非子书序》中讲：

非子书，大抵薄仁义，厉刑禁，尽斥尧、舜、禹、汤、孔子，而兼取申、商惨刻之说。其言恢诡叛道，无足多取……三代而后，申、韩之说常胜。世之言治者，操其术而恒讳其迹。余以为彼其尽纳圣贤之旨，而独能以其说击排诋訾，历千百年而不废，盖必有所以为《韩非子》者在矣。

他站在儒家仁义思想的立场上批判韩非之言不合于儒家之道，不足多取。但也承认世人讨论治国问题，多采纳韩非之术，但却不能明言。韩非的思想不合圣贤的思想主旨却可历经千百年而未断绝，必然有其得以流传的理由。明人张鼎文在《校刻韩非子序》中说：

曰《五蠹》，曰《显学》，曰《忠孝》，文之至也。……《忠孝》之意，诋訾孔子、尧、舜、汤、武于君臣父子兄弟之间，皆非所以教天下，狂者之言也。

他肯定韩非之文的价值,但仍是站在儒家思想的立场上批判韩非思想不可用来教天下。

上个世纪以来,关于《韩非子》的研究突破了古代学者不可避免的学派立场的偏见,且有了现代西方学科体系的参照,取得了众多影响至今的研究成果。在1949年以前,对韩非及《韩非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韩非的生平、《韩非子》篇目真伪的考证、《韩非子》一书的校释以及参照西方学科体系对韩非思想的梳理。这一时期《韩非子》研究的代表作有容肇祖的《韩非子考证》,陈启天的《韩非的生平》、《韩非及其政治学》,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之《韩非子批判》,刘师培的《韩非子斟补》,陈千钧的《韩非新传》、《韩非子书考》,谢无量的《韩非》,洪嘉仁的《韩非子的政治哲学》,张陈卿的《韩非的法治思想》等。此外,胡适、梁启超、高亨、冯友兰、钱穆等先生也在他们的著作中对韩非生平、《韩非子》一书的真伪问题及其思想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在《韩非子》的校释、资料整理方面,有陈启天的《韩非子校释》、《韩非子参考书辑要》等代表作。

1949年后到改革开放前,大陆学术界基本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进行诸子的研究,对《韩非子》的研究亦是如此。梁启雄的《韩非思想述评和探源》、任继愈的《韩非》、周钟灵《韩非子的逻辑》是这一时期研究韩非思想的代表作。此外,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的《中国思想通史》,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等思想史著作均以专章论述韩非思想。这一时期的学者们多利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韩非的阶级属性,用唯物史观探讨韩非的历史哲学,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个哲学阵营的斗争分析韩非的道理论、认识论,用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分析韩非的矛盾观,对韩非思想的进步性和局限性进行了剖析。这一研究方法以及通过这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研究成果至今仍影响着学术界。^①同时,这一时期,对《韩非子》的注释工作有了大的进展,陈奇猷的《韩非子集释》和梁启雄的《韩子浅解》均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改革开放以后,《韩非子》研究进入新的阶段,研究方法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在考证、校释、思想的系统研究方面均有新的成果问世。校释方面有周勋初主编的《韩非子校注》,张觉的《韩非子全译》、《韩非子校注》、《韩非子校疏》等,陈

^① 如周勋初的《韩非》出版于1985年,但仍深受这一研究方法的影响,他讲:“韩非对《老子》中的‘道’与‘德’这一对哲学范畴,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认为道是与天地开辟一起出现的物质实体和自然法则,而不是‘先天地生’的精神实体。”(周勋初:《韩非》,郭沫若、王元化等著,傅杰选编:《韩非子二十讲》,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42页。)”“韩非的法治理论,既有它先进性的一面,也有反动的成分。这种地主阶级新的思想武器,在扫除奴隶主阶级‘亲亲’、‘尊尊’、‘刑不上大夫’等社会观念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方面,是锐利的思想武器,因而在韩非的笔下,显得生气勃勃,富于幻想。但它又是地主阶级镇压广大人民的手段,因而有其残酷的一面。”(同上,第20页。)”“荀子主张效法后王,而不再提倡效法先王。这对韩非的社会进化观的形成,当然会有影响。”(同上,第41页。)”“它在战国后期出现时,代表着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在当时来说,起到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但随着封建王朝的巩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加剧,韩非学说的反动性也逐渐显露出来。”(同上,第54页。)

奇猷因对韩非思想的新理解和收集到可贵的新资料而重写《韩非子》的注解,名为《韩非子新校注》。专著有周勋初的《韩非》、《〈韩非子〉札记》,孙实明的《韩非思想新探》,谷方的《韩非与中国文化》,蒋重跃的《韩非的政治思想》,施觉怀的《韩非评传》,周炽成的《荀子韩非子的社会历史哲学》,陈奇猷、张觉的《韩非子导读》,宋洪兵的《韩非政治思想再研究》等,将《韩非子》研究推向了系统化。同时,众多学者们的哲学史、伦理学史、政治思想史、法律思想史等类著作中,也都对韩非思想进行了研究和阐释。近年来,《韩非子》研究也逐渐成为学位论文选题的热门。此外,关于《韩非子》研究的论文数量增多,涉及哲学、历史学、文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等不同领域。虽然学术界对韩非思想仍有整体上的否定评价,如施觉怀讲:“在总体上,我不得不否定韩非思想,因为它不仅是‘明显地为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和封建伦理关系’(匡亚明:《孔子评传代序》),还为极端的独裁和暴政提供一整套理论,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阻滞作用。即使到了今天,仍须继续肃清其在人们思想中的流毒。”^①但近期的研究更多肯定了韩非思想的合理性和价值所在。

与大陆的《韩非子》研究相比,港台的《韩非子》研究呈现出更好的发展态势,出版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专著。如郑良树的《韩非之著述及思想》,王晓波与张纯合作完成的《韩非思想的历史研究》,王静芝的《韩非子思想体系》,王邦雄的《韩非子哲学》,封思毅的《韩非子思想简论》,赵海金的《韩非子研究》,王赞源的《中国法家哲学》和《韩非与马基维利比较研究》,高柏园的《韩非哲学研究》,姚蒸民的《韩非子通论》,张素贞的《韩非子的思想体系》、《国家的秩序——韩非子》和《韩非子的实用哲学》,朱瑞祥的《韩非政治思想之剖析》,陈拱的《韩非思想衡论》,李增的《先秦法家哲学思想》等。

在英语世界中,关于《韩非子》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关注。《韩非子》的英译本主要有:韦利·阿瑟(Waley Arthur)的《古代中国的三大思想》(*Three ways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选译了部分章节;华兹生(Burton Watson)的《韩非子:基本著作选》(*Han Fei Zi: basic writings*)选译了《主道》、《有度》、《二柄》、《扬权》、《八奸》、《十过》、《说难》、《和氏》、《备内》、《南面》、《五蠹》、《显学》等12篇;廖文奎(W. K. Liao)的《韩非子全书:中国政治学经典》(*The complete works of Han Fei Tzu: a classic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是《韩非子》的全译本。本杰明·史华兹(Benjamin I. Schwartz)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葛瑞汉(Graham, A. C.)的《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Disputers of the Tao: philosophical argument in ancient China*)、陈汉生(Chad Hansen)的《中国思想中的道论:一种哲学的解释》(*A Taoist theory of Chinese thought: a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等哲学史著作均将

^① 施觉怀:《韩非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韩非作为先秦思想中的一大家对其著作和思想进行了探讨。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专著中也会涉及对韩非思想的研究,如安乐哲(Ames, Roger T.)的《主术:古代中国政治思想研究》(*The art of rulership: a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用大量的篇幅从历史哲学、无为、势、法、用众等方面探讨了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的思想观点。近年来,以《韩非子》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增多,说明这一研究方向日益受到重视。但与其他中国古代思想家相比,韩非在英语世界得到的关注仍然不够。

总而言之,《韩非子》在国内外的学术界均成为越来越受关注的研究课题,虽然取得了众多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单就大陆学术界来说,其研究成果的薄弱之处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研究论文数量多,研究者分布于各个学科领域,但专注于《韩非子》研究的学者很少,因此,深入的、体系化的研究成果仍然缺乏。其次,对《韩非子》思想的普及工作做得较好,各种注释、导读、思想浅释类的著作层出不穷,但研究专著仍然较少。最后,在对韩非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中,仍偏重于发掘韩非的法、术、势等政治思想,对韩非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的研究不够深入,阻碍了对韩非思想体系的整体性理解,致使对韩非思想的理解陈陈相因,少有新的角度和大的突破。

关于韩非思想的基础问题,司马迁已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讲:“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他认为韩非思想以黄老学为本。但是,由于对《韩非子》中以《解老》、《喻老》为代表的,与道家关系密切的各篇是否为韩非所作存在争议,因而对这些篇的思想与其他篇章的思想是否可融为一个体系有不同的看法。否认其为韩非作品的学者自然不会将此类思想视做韩非思想的基础进行分析,如容肇祖讲道:“韩非与李斯俱学于荀卿,何以忽归本于黄老?”^①而持不确定态度的学者也不可能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如王叔岷认为司马迁以韩非之学归本于黄老可能与《解老》、《喻老》有关,但他不确定两篇为韩非作品,他认为,“何以司马迁以老子、韩非合传,而谓韩非之学本于黄、老,原于道德之意?盖由司马迁已见及韩非有《解老》及《喻老》篇,又明引黄帝之言邪?此大可深思者也。”^②但他并未探讨这一“大可深思”的问题。而肯定其为韩非作品的学者也多只依据司马迁的论断而得出韩非思想与黄老之学不相矛盾的结论。可以说,直至今日,学术界尚未从整体上探讨和解决韩非思想如何以黄老之学为本的问题。周勋初在其《〈韩非子〉札记》一书中有《研究韩非哲学的一条新途径》一篇,提出:“研究韩非与《管子》的关系,特别是与里面一些黄老学派著作的关系,看他

① 容肇祖:《韩非子考证》,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叙,第1页。

② 王叔岷:《先秦道法思想讲稿》,台北: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中国文哲专刊,1992年版,第248页。

们运用了哪些基本概念,从而勾出其发展线索,就有可能在研究韩非学说的工作中得到收获。这是一条研究韩非著作的新途径,个人只是一点小小的尝试而已。”^①很遗憾,周先生未将这一尝试继续下去,这一研究思路也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另一方面,由于《汉书·艺文志》中所著录的以“黄帝”命名的书籍一度从思想史上消失,造成了“黄老”这一“名”与其“实”的分离,使学者们对何为“黄老”充满疑问,更无法确定黄老思想的特征。因此,探讨韩非思想与黄老之学的关系就成为一个本身就充满不确定性的问题。学者们更多讨论的是韩非与老子思想的关系,如从《解老》和《喻老》两篇入手讨论韩非对老子思想的继承和改造。^②甚至萧公权将黄老之学等同于老庄之学,反对司马迁关于韩非思想以黄老之学为本的观点:“道法之说无为,语亦相混。吾人若就‘为我’与尊君一端察之,则二家之根本区别亦立见。《史记》谓申韩原于老庄,《汉书》以《管子》列于法家,就现存之文献以论,此皆不揣本而齐末,取形貌而略大体,未足以定论也。”^③

幸运的是,1973年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出土为我们揭开了黄老的面纱。这部分佚书包括《经法》、《十大经》、《称》、《道原》四篇,^④被认为是《汉书·艺文志》中所载的《黄帝四经》。^⑤自此以后,学术界掀起了黄老学的研究热潮,关于黄老学的思想特征和黄老学作品的认定、黄老思想与各家各派的关系均成为重要的问题。韩非作为法家思想的代表,探讨其思想与黄老之学的关系对《韩非子》研究、黄老思想研究以及法家与道家关系的研究均有重要的意义。但遗憾的是,《黄帝四经》已出土三十余年,关于韩非思想与黄老之学的关系问题仍未得到广泛的重视和很好的解决。

① 周勋初:《〈韩非子〉札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8页。

② 谢无量的《韩非》在第一编《韩非学术之渊源》部分第二章《道家之为韩非学之渊源》中探讨了韩非与老子前道家之关系和韩非与老子之关系,没有韩非与黄老的关系;陈奇猷的《韩非子新校注》附录中有《韩非与老子》;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探讨韩非思想的部分有《韩非对〈老子〉的改造》。此类论文很多,如冯友兰的《韩非〈解老〉〈喻老〉新释》(《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1年第2期)、周乾藻的《韩非之学原于〈道德〉说辨证》(《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谢祥皓的《韩非的道和法——兼论韩非与老子的关系》(《江淮论坛》,1981年第6期)、李定生的《论韩非〈解老〉和〈喻老〉》(《道家文化研究》第10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等。

③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8页。

④ 帛书首篇为《经法》,包括《道法》、《国次》、《君正》、《六分》、《四度》、《论》、《亡论》、《论约》、《名理》九节。第二篇为《十大经》,包括《立命》、《观》、《五正》、《果童》、《正乱》、《姓争》、《雌雄节》、《兵容》、《成法》、《三禁》、《本伐》、《前道》、《行守》、《顺道》、《名刑》共十五节。第三篇为《称》,第四篇为《道原》,均不分节。

⑤ 如唐兰认为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老子》乙本卷前的古佚书,就是汉志所著录的《黄帝四经》(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研究》,《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陈鼓应同意唐兰的观点,也认为:“马王堆出土的《经法》等四篇古佚书,即《汉书·艺文志》所称的《黄帝四经》。”(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9页。)

要深入分析韩非思想与黄老之学的关系,首先要确定黄老学的思想特征。学者们多根据对《黄帝四经》中的思想和其他古代文献中相近思想的比较分析,概括出黄老学的特征,这样的工作对黄老学的深入研究有重要意义。^①但是,这一研究方法面临着一个问题:因为“黄老”这一名称是对一类思想的共同特征的概括,是个通名,而每一部黄老学著作除其共性外还有其个性,面对一些具体的黄老学著作,明确地分析出哪些思想是它们作为黄老思想而共同具有的,哪些是它们独具的非常困难。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本书不采用从现存黄老著作出发总结出其共同特征的方法。此外,有学者依据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对道家思想特征的概括来确定黄老学的特征,这一方法可以避免前一方法的缺陷,但仍需其他的佐证材料以增加结论的可靠性。^②本书从“黄老”这一名称的含义、史籍中关于“黄老”的记载以及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对道家思想特征的概括三个方面相互印证,得出黄老学的思想特征。在此基础上,我们对《韩非子》一书中具有黄老学思想特征的思想进行分类分析。本书对韩非思想与黄老之学关系的研究不是简单的异同比较,而是要解决韩非继承了黄老之学的哪些思想,又对这些思想进行了怎样的发展和改造,又如何将他的刑名法术之学建立在其改造后的黄老之学的基础之上,以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从而解决司马迁所说的韩非思想“归本于黄老”的问题。不同于学术界一般从法、术、势几个方面分析韩非思想的研究方法,本书以黄老学的思想特征为基础,从全新的视角对韩非的思想体系进行解释。

本书一般对《韩非子》原文作大段的引用,一方面可以避免断章取义,同时也可以体现出韩非自身的逻辑和论证过程。考察韩非的论证过程,我们发现,类比推理是韩非最主要的推理方式,贯穿于《韩非子》全书。类比推理以两事物或多个事物同类为前提,从一事物具有某性质和规律,推论出其他事物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和规律。韩非经常以人们习见的事物和现象作类比,推出自己的观点。韩非论证他的观点,多采用正反两方面论证的方式,如韩非主张君主应如何,会从反面论证君主不如此则会有不好的结果发生,因此,要避免发生不好的后果,君主必需如此。此外,举例论证也是韩非主要的论证方法,矛盾不两立则是韩非主要的思维方式。这些对韩非自身逻辑和论证过程的分析有

① 如陈丽桂通过分析《经法》等四篇和同时出土的《伊尹·九主》,得出结论:“都充满道法色彩,都从天道上去讲治道,它们下降老子的‘道’去牵合刑名,为‘刑名’取得合理根源,也用‘刑名’去诠释老子的‘无为’。继承并改造老子的雌柔哲学,转化为正静、因时的政术。同时攫取阴阳家与法家的理论,去调和和润饰这些因道全法的理论。”她认为这是黄老思想的纲领。(陈丽桂:《战国时期的黄老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年版,序,第4页。)

② 如丁原明依据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概括黄老学的特征为:第一,以“道”为根本,因循事物的客观法则。第二,无为而无不为,通过遵循和利用客观法则,达到有所作为。第三,吸取各家的优点和长处,抛弃缺点和短处。第四,积极入世的精神。(丁原明:《黄老学论纲》,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28页。)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韩非与《韩非子》	1
第一节 韩非生平	1
第二节 《韩非子》各篇的真伪问题	4
一、《韩非子》各篇的真伪之辨	4
二、关于《韩非子》真伪之辨的评论	9
第二章 黄老之学与韩非	17
第一节 黄老学的思想特征	17
一、“黄老”释名	17
二、史籍中的黄老之学	21
三、司马谈所论“道家”	22
第二节 《黄帝四经》与《管子》四篇	25
一、道与法	26
二、虚静	36
三、责因	40
四、形名	47
第三节 韩非的学术背景与黄老学的关系	51
第三章 道法思想	58
第一节 道论	58
一、道的本原义、规律义及统治术之义	59
二、道的特性	62
第二节 道与理	65
第三节 道与法	69
一、法与道的一致性	69
二、法的稳定与变化	72
三、重刑重罚论	75
四、法的普遍适用性	77
第四节 道与仁、义、礼	79

一、仁、义、礼源于道	79
二、仁、义、礼与法	82
第五节 道与君臣关系	86
一、君臣不同位	86
二、君臣不同利	90
小 结	93
第四章 虚静思想	95
第一节 道家的虚、静与虚静	95
一、虚与静分用	95
二、虚与静对举	97
三、虚与静连用	98
第二节 韩非思想中的虚与静	98
一、韩非之“虚”与“德”	99
二、韩非之“静”	101
第三节 虚静与认识	102
一、虚静与认识能力	102
二、情、欲与认识	104
第四节 虚静与法、术	106
一、公与私	107
二、虚静术	112
小 结	114
第五章 因与无为	116
第一节 因事之理	117
第二节 因资而立功与因其势	121
一、因资而立功	121
二、因其势	122
三、因其势与君之无为	130
第三节 因人情	133
一、人性与人情	133
二、好利、自为之人性	138
三、因人情	140
第四节 韩非之因与老子之无为	147
小 结	151
第六章 形名学说	153
第一节 形名学说的起源与发展	153
一、形名与名实	153

二、形名学说的起源	156
三、形名学说的发展	158
第二节 名正物定	161
第三节 审合刑名	164
一、参伍之验	164
二、以功用为标准	165
三、审言辞以禁奸	167
第四节 循名责实	171
小 结	173
结 论	175
附录一 韩非所引《老子》与王弼本、竹简本、帛书甲、乙本之比较 与分析	180
附录二 《庄子》的道论与老子思想传播	212
主要参考文献	221
后记	230

第一章 韩非与《韩非子》

先秦诸子生存的年代久远,关于他们的身世经历无太多材料可供参考;同时,先秦诸子的著作也面临着编辑和流传中的众多问题。因此,研究韩非思想,首先应澄清关于韩非其人和代表其思想的《韩非子》一书的若干问题。

第一节 韩非生平

《孟子·万章》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读一个人的书、了解一个人的思想要“知人论世”,就是要了解作者的身份、性格、生存年代、生活经历和他所遭遇的社会环境,我们对韩非思想的解读亦如此。韩非是战国末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对韩非的生平、著述、思想来源有如下记载:

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使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

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韩子皆著

书,传于后世,学者多有。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礅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史记·秦始皇本纪》和《史记·韩世家》也涉及韩非的事迹:

大索,逐客,李斯上书说,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说秦王,请先取韩以
恐他国,于是使斯下韩。韩王患之。与韩非谋弱秦。

十四年,攻赵军于平阳,取宜安,破之,杀其将军。桓齮定平阳、武
城。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韩王请为臣。

王安五年,秦攻韩,韩急,使韩非使秦,秦留非,因杀之。

关于韩非的身份,《老子韩非列传》讲:“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公子”指诸侯之庶子,以区别于世子,也可以用来泛指诸侯之子。《礼记·服问》云:“传曰‘有从轻从重’,公子之妻,为其皇姑。”郑玄释“公子之妻”为“诸侯妾子之妻”。^①《诗·豳风·七月》云:“殆及公子同归。”孔颖达正义:“诸侯之子称公子。”^②因此,韩非应为当时韩国的宗室之后。韩非的这一身份,使他尤其关注韩国的处境和生死存亡的问题,也使他对韩国的权利斗争有更深切的感受,对政治现状中的各种复杂问题有更清晰的了解。

关于韩非的出生年份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李斯韩非考》中提出韩非大约生于公元前280年左右,“韩非与李斯同学于荀卿,其使秦在韩王安五年。翌年见杀,时斯在秦已十五年。若韩李年略相当,则非寿在四五十之间。”^③从公元前233年韩非去世之年向上推算40至50年,为公元前273年至前283年,接近公元前280年。陈千钧在《韩非新传》一文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韩非子·问田》中有堂谿公与韩非问答之言,则堂谿公与韩非同时无疑,而《外储说右上》又有堂谿公与韩昭侯(前358年—前330年在位)问答的记载,则堂谿公与韩昭侯亦同时。大约韩昭侯晚年(前330年)堂谿公还只有二三十岁,与韩非谈论时已九十余岁,此时韩非应二十余岁。韩非应年长于李斯,被杀时已六十余岁,约生于韩厘王初年,所以假定韩非生于韩厘王元年即公元前295年。^④陈奇猷在陈千钧的例证之外,又提出秦王见韩非的《孤愤》、《五蠹》而不知作者,李斯以韩非对,则李斯一定是在与韩非同学于荀子时已见韩非之书,李斯入秦在始皇元年前一或二年,此时韩非之学已大有成就,年龄可能在五十岁

① 朱彬:《礼记训纂》,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829页。

② 毛公传,郑玄笺,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80页。

③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51—552页。

④ 陈千钧:《韩非新传》,《学术世界》1卷2期,上海:世界书局印行,1935年版,第84页。

左右,以此推论,韩非被害时应在六十五岁左右,其生年约在公元前 298 年。^①对于古人生卒年的考订是以各种假定为基础的,陈奇猷批评钱穆关于韩非与李斯年龄相仿的假定不可靠,因为当时的同学年龄可能差距较大,且关于李斯入秦的年龄也没有确实的证据,很有道理,但陈奇猷关于韩非之学大有成就时应在五十岁左右的假定也并不可靠,韩非为韩国宗室之后,拥有优越的求学条件,复杂的生活环境也可能造就韩非思想的早熟。且古书中经常造作故事,^②陈千钧考证所依据的《问田》、《外储说右上》中的记载也并非绝对的事实。因此,我们只能确定韩非生活于战国后期,经历韩厘王、韩桓惠王、韩王安三个国君在位的时代。

韩厘王二十三年(公元前 273 年),赵、魏联军进攻韩国华阳,秦军来救,打败赵、魏联军。从此,韩国一直依附于秦国,正如韩非在《存韩》中所讲:“韩事秦三十余年,出则为扞蔽,入则为席荐。秦特出锐师取韩地,而随之怨悬于天下,功归于强秦。且夫韩人贡职,与郡县无异也。”《饰邪》讲:“今者,韩国小而恃大国,主慢而听秦魏,恃齐荆为用,而小国愈亡。”可见,韩非生活的年代正是韩国遭强邻欺凌,丧失主权,濒于危亡之际。韩非因为口吃而不善言辞,但是善于著书。在青年时代,他鉴于韩国国势衰弱曾多次上书韩王陈述自己的强国思想,但未被采用。面对韩王不修明法制,不知凭借自己的权势而控制群臣,不奖励耕战,却听信虚言浮说,尊重儒侠,韩非十分愤慨。于是,他针对社会现实中的种种问题,总结历史上的成败得失,写成《孤愤》、《五蠹》、《内储》、《外储》、《说林》、《说难》等几十篇文章。韩王平时不用韩非,但在危急时刻曾与韩非研究过削弱秦国的策略。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韩非的才华令李斯自愧不如。

韩非不得韩王任用,其思想却得到了秦王嬴政的赏识。有人将韩非的文章传到了秦国,秦王读到《孤愤》、《五蠹》而赞叹道:“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秦王于是发兵攻韩,韩王只得派韩非出使秦国。韩非来到秦国以后,上书秦王主张保存韩国。李斯、姚贾等乘机陷害他,说韩非终究是维护韩国的利益,而不能忠心为秦,如不任用韩非将其放回韩国则于秦国有害,因此建议秦王“以过法诛之”,于是韩非被降罪入狱。韩王安六年(公元前 233 年),李斯派人送毒药给韩非,令他自杀。韩非想面见秦王申诉,却没有机会,因此被迫自尽于云阳狱中。秦王后悔又想用韩非,但韩非已死。韩非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司马迁反复感叹:“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① 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版,第 1213 页。

② 参见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第 76—91 页。

第二节 《韩非子》各篇的真伪问题

据司马迁记载,韩非著书共十万余言,包括《孤愤》、《五蠹》、《内储》、《外储》、《说林》、《说难》等篇。韩非所著之书,历代史书中的艺文志、经籍志均称为《韩子》。例如,《汉书·艺文志》诸子法家类:“《韩子》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子部法家类:“《韩子》二十卷目一卷。”《旧唐书·经籍志》丙部子录法家:“《韩子》二十卷。”《新唐书·艺文志》丙部子录法家:“《韩子》二十卷。尹知章注韩子。”《宋史·艺文志》子书法家类:“《韩子》二十卷。”《四库全书总目》亦称《韩子》,其子部法家类有“《韩子》二十卷,周韩非撰”。宋代以后,韩愈被称为“韩子”,为了避免韩非之书与韩愈之书相混,有人就改称韩非之书为《韩非子》,如宋代目录学家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称《韩非子》,清代孙星衍的《孙氏祠堂书目·诸子法家》:“《韩非子》二十卷。”卢文弨有《群书拾补·韩非子》。现代的学者多称《韩非子》。但宋代以后也有学者仍称韩非之书为《韩子》,如宋代王应麟的《汉艺文志考证》:“《韩子》五十五篇。”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題》法家类:“《韩子》二十卷。”现代的梁启雄著有《韩子浅解》,仍称《韩子》。可以说,自宋代以来,年代越近,越多称《韩非子》。

关于韩非之书的篇数卷数,《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子》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均作二十卷。现在流传的《韩非子》的篇数和卷数均与史书中的记载相符。但是,先秦古人著书多是单篇流传,如秦王所见韩非之文章,并非编辑成册的韩非之书,而只是个别篇章;而且先秦古人著书,多不自署姓名,如韩非的《孤愤》、《五蠹》为秦王所见,秦王并不知道作者是谁,李斯与韩非熟识,因此知道这些文章为韩非所著;先秦子书编辑成册多为后人所为,因此在篇目的选择、整理、编排过程中会出现将其他作者的文章、门弟子的文章编入其中的现象;古籍流传时间久远,在流传过程中可能出现错漏、颠倒、更改、伪托、增益、注解混入正文等现象。因此,古书无论是在编辑过程中还是流传过程中均可能会出现与原作者所作文章的差异,因此,研究古人的思想,首先均需面对古籍的整理、辨伪、正误等考证辨析的工作,对韩非思想的研究亦如此。

一、《韩非子》各篇的真伪之辨

关于《韩非子》一书中各篇的真伪问题争议颇多,整体来看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一种认为《韩非子》一书中的大部分均非韩非作品。如胡适认为:“《汉书·艺文志》载《韩非子》55篇。今本也有55篇。但其中很多不可靠的。”“《韩